

第二章 曹溶之生平與著作

一部作品的產生，是無法將作者抽離所處的時代環境，所謂不知古人之世，不能妄言其文辭；不知古人之身處，不可遽論其文，因此本章從知人論世入手，以明瞭曹溶的生平概況及大時代下的詞壇風氣為基調，輔以著作部份，以將作品置於客觀有據的歷史環境中，如此才能領略文本中作者所欲傳達的情感，深度的境界與涵義，以獲得作品全面的價值。

本章將分三節做討論，第一節處理的是時代背景，交代在明末清初的背景，明代走向滅亡的原因是什麼，而清代統治者如何處理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課題，是鎮壓或是安撫，兩者的比例應該怎麼調整。在這大背景下，回顧清初的詞壇，雖然難掩明末的柔婉嬌媚的餘風，但是，清初的詞人也有試圖脫離前人侷限的自覺，自覺又表現在哪些方面。第二節介述的是曹溶的生平，在曹溶生平方面，分成仕明時期、仕清時期與退隱時期一共三個時期，試圖探討心境上的轉折變化。第三節就曹溶的《靜惕堂詞》與其他著作方面提出說明。



曹溶一生在明代三十一年，清代四十二年，身經明末的戰爭，清初的混亂高壓統治，在康熙中葉後政治民生漸趨安定，由混亂到安定，詞人筆下的內容也會反映歷史的軌跡，可以說時代與創作是密不可分的關係。於是下面將從大時代——明清之際的背景談起，針對明末清初政局、與為政者的施政做出說明，了解大環境下，易代詞人該如何尋求自我的定位，再談論清初詞壇的概況，基於明末詞風的承續或轉變，清初新的文風正蘊釀而起，藉此說明曹溶在當時詞壇的地位。

一、明清政局

在中國歷史上，新舊朝代的沿革是必然現象，孔子(前 511—前 479)之後的「華夷之辨」、「嚴夷夏之大防」被視為「春秋大義」，是儒家思想體系乃至於成爲中

國人文傳統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由漢人政權統治或由少數民族統治是迥然不同的震撼，回顧漫長的歷史軌跡，在南北朝、在宋元之際、還有明清易代，這三個時期，或漢族政權與少數民族政權同時且南北對峙，或在北的少數民族政權以武力手段入主中原。總之，都是兩個民族矛盾衝突激起之時。

明代開國之祖朱元璋(1328—1398)，以一介布衣，推翻元朝異族，建立明朝，重新恢復漢人政權。不料中葉以後，漸走下坡，內有深宮之爭，政壇結黨營私，搜括民脂；外有女真勃興東北，西北有流寇，兩遼有清人，天災人禍，內憂外患，政府不能不用兵，用兵不能沒有糧餉，然而貪官污吏已失民心，流寇更是氣勢日張，如此的內外交迫，明朝對內對外已是捉襟見肘。即使後有崇禎皇帝想要力挽狂瀾，勵精圖治，但因個性急躁多疑，身邊小人環伺，直到流寇逼進北京，才知歷史的局面大勢已去，¹免不了走向滅亡一途。

在中國各個王朝中，明朝是中央集權達到顛峰造極的一個朝代。由於自古以來，中國王朝的命運都繫於君王與臣子之手，因此如果一個朝代的君主賢明，臣子上行下效，兩者相輔相成，政治與社會就能國泰民安，百姓也能樂其所居；相反地，假使一個朝代的君主昏庸無能，或者臣子貪婪營私，終將導致社稷危亡，人民流離失所，明朝的滅亡就是在此一伏筆下，漸漸走向衰敗的。明英宗以幼年即位，所以宦官才得以玩弄權勢，到了熹宗也以幼年即位，而宦官魏宗賢(1568—1627)因此趁機結黨，形成朝政裡一個隱憂，更趁此拉攏和自己同樣的臣子，打擊其他和自己不同路子的臣子。趙翼(1727—1814)在《廿二史劄記·明代宦官》中說道：

有明一代宦官……致禍之由，亦不盡由於通文義也。王振、汪直、劉瑾固稍知文墨；魏忠賢則目不識丁，而禍更烈。大概總由於人主童昏，漫不省事；故若輩得以愚弄，而竊威權。如憲宗稍能自主；則汪直始雖肆恣，後終一斥不用。武宗之於瑾，亦能擒而戮之，惟英、熹二朝皆以沖齡嗣位，故振、忠賢得肆行無忌。²

宦官危政的情形到了明神宗更為嚴重，這些都在文人眼裡造成不小的影響。萬曆皇帝的怠政，放棄肩上該有的責任，底下的臣子得不到皇帝的重用，更無力去輔

¹參見蕭一山：《清史大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6。

²(清)趙翼：《廿二史劄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史評》影印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五年湛貽堂刻本)，卷35，頁609上。

佐無心於國家的君主，加上宦官在旁虎視眈眈，就算膽敢發聲的忠臣，也很難扭轉頹勢。既然中央已是混亂，地方情況就可想而知是頹敝，這樣的惡性循環下，明代的滅亡日子自然不遠。

關於明代混亂的黨爭現象，身處政治中心的曹溶在《崇禎五十宰相傳》中曾經有所論述：

黨人之禍，自古已然。……丁卯以前，流毒已甚，戊辰以後，公道大明。然而門戶相承，衣鉢相禪，邪正雖殊，其為植黨則一。³

曹溶雖反對私心朋比的閹黨逆臣，但對那些門戶相承，一味培植壯大自己勢力的人士也不贊同。因為他們同樣都是以自己的勢力為考量，對於政治毫無幫助，互相的爭權奪利，只加速了明朝的衰敗。

明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闖王李自成(1606—1645)由彰義門攻入北京，次日，明思宗朱由檢(1611—1644)自縊於煤山，歷史上稱之為「甲申之變」。同年四月，明朝皇帝殉難的消息傳到南京，馬士英(?—1646)與魏忠賢(1568—1627)舊黨阮大鋮(1587—1646)密謀冊立福王朱由崧(1607—1646)即位，福王即位後，這些人就以輔佐有功，霸佔朝廷，橫行無阻，並沒有想要鞏固明朝政權，為已故的明朝皇帝報仇。在這樣的局勢下，可以想見，福王的政權是不可能維持長久。

五月，清攝政睿親王多爾袞(1612—1650)在吳三桂(1612—1678)的幫助之下，率八旗軍攻下山海關，打敗李自成，而李自成以農民起義建立的政權在北京僅僅維持一個半月。他占領北京，是為順治元年。順治二年的四月，滿人攻陷揚州，五月打下南京，原本處於南京的反清復明的人，不得被迫往更南方的據點，據此，魯王朱以海(1618—1662)扶立於紹興，唐王朱聿鍵(1602—1646)扶立於福州，南明的王朝雖有福王、魯王、唐王、桂王的抵抗，最終仍無法改寫這歷史上的重大一頁。

滿人是以少數民族進入中原，人數不僅遠遠少於漢族，在文化上也較漢族落後，在取得政權之後，為了鞏固在位者的權勢，維護滿人本身的利益，實行許多壓迫漢民族的政策，因為是少數民族，漢民族的反抗意識更是激烈，清世祖一統中國的首要工作即是壓迫漢人的行為，防止滿漢起衝突。一開始在順治元年

³(清)曹溶：《崇禎五十宰相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傳記》影印南京圖書館藏清研古樓抄本)，頁106上。

四月頒布的「薙髮令」，強制要漢人剃髮易服，以此考驗漢人是否已經臣服於滿人的統治，從剃髮蓄髮看出人心的順逆，時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之說。同時對於力圖反清復明的漢人，即風聲鶴唳地採取血腥鎮壓的手段，大肆殺戮，如清兵在順治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在揚州屠城十天，稱之為「揚州十日」，同年的七月四日，清兵攻破嘉定，對嘉定三次屠城，史稱「嘉定三屠」的歷史悲劇，為了壓制漢人懷思故國、追念前朝的氛圍，大興文字獄，一案中少說數十人，多則數百人受到牽連，比起之前王朝的政權轉移更為嚴苛。同時為了打擊反抗意識最強烈的江南文人，在順治十四年，有南北兩闈的科場案，順治十八年的「奏銷案」⁴和「通海案」⁵。文人誠惶誠恐、噤若寒蟬，在言語在行為上不得不處處留意，生怕有所觸犯。只好把精力用在考據上，一來是因為為政者的手段，二來對於向來能抒發性情的詩文，往往動輒得咎，也逐漸不以創作表達內心的聲音。

自康熙掌握政權以後，政治上雖不很穩定，但比起清初的混亂，聖祖自知以高壓統治人民，雖然可以短時間內建立起政權，但這種強迫的政權在漢人看來並不是正統的繼承，高壓究非長久之計，因此「文治」與「武功」同時施行，採取一系列休養生息的措施，安定社會秩序，緩和民族衝突，整個社會經濟也慢慢繁榮，人民經歷明末戰爭的離亂之後，到這時候有了喘息的機會，對文人則運用籠絡的手腕，如開設博學鴻詞，積極表現出愛好文學、認同並弘揚漢人民族的文化，這些舉動，無疑能逐漸讓文人卸下敵意，能以平和的方式接納新入主的滿族政權，一方面鞏固滿人新王朝的統治，一方面也促進漢人學術的發展。

二、詞壇概況

詞作為隋唐以來的音樂文學，原本是為了讓歌妓在飲宴場合演唱所用，有所謂「小道」、「豔科」之說。唐宋詞有不少作品即是為歌妓而作，在許多宋人

⁴「奏銷案」：江南官紳於明末經年拖欠錢糧，清初，江南賦稅甚重，以蘇州、松江等府為最。順治十六年，清朝訂定條例，只要是江南拖欠錢糧者，必予以懲罰，但江南仕紳仍拒繳如故。康熙登基之初，朝廷嚴催順治十七年奏銷錢糧，原本只限定無錫、嘉定兩縣。到了順治十八年，巡撫朱國治剛復自用，造欠冊清查，上萬人數的進士、舉人等等，以抗糧的名義，衣冠掃地，在當時兩江士紳得全者無幾。

⁵「通海案」：起因於地方官吏與土豪劣紳相互勾結，魚肉鄉民引起民憤。官吏借鄭成功攻佔金壇一事，移禍於仗義執言的十名諸生，發生一幕通海冤案，累及無辜的六十餘人死亡。

筆記中對文人與歌妓間的往來尤為津津樂道，儘管這些愛戀故事大多已不可考，但唐宋歌妓這一社會文化現象，無疑地為詞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一個不可缺少的基礎。然而自蘇軾以詩為詞以後，將花間以來婉約的詞風一轉為豪放的風格，不論協律與否，打破詞作為音樂文學的窠臼。南宋以後，南戲與北曲的崛起，人們的眼光逐漸移到這些新興文學上，詞所依附的音樂性逐漸喪失，不能倚聲填詞，也不再是遣興飲宴的文學，娛樂功能隨之消失，成為純文學的形式。

之後的元代百年間雖也有詞的創作產生，但當時文人著重在戲曲與小說等新的文學形式，這個時代的詞並沒有新的發展，沒有翻出新的面貌，它僅是沿襲宋詞傳統的創作方式，亦步亦趨而已，再由於曲是元代的新興文學，它的產生原因很多，如詞的衰落、詞調的轉變、詞句的語體化、諸宮調的興起、外來音樂的影響等等⁶。於是詞原來含蓄隱約、託興深微的本質便受到曲的直率的特性所衝擊，文人走向放縱、不諱飾、缺乏蘊藉的描寫，這在戲曲裡表現的最為明顯，在詞創作亦出現輕淺浮豔的風格。因此，吳梅(1844—1939)在《詞學通論》上提到：

唐五代兩宋人之作，為詞學極盛之期，自是而後，此道衰矣。金元諸家，惟吳(激)、蔡(松年)、遺山為正，餘皆略事聲歌，無當雅奏。元人以北詞見長，文人心力，僅注意於雜劇，且有以詞入曲者，雖有疏齋、仁近、蛻巖諸子，亦非專家之業也。⁷

明代前後長達二百七十餘年，在中國歷史上是一段不算短的時間，對上而言，是宋元詞的一脈相承；對下而言，是清詞中興的前提基礎。這時候的文學上，除了反映基層人民心聲的小說、戲曲等的通俗文學和由文人創作的傳奇以及晚明的小品文有較高的成就以外，詩文等方面則明顯地走向衰落。明代中葉之後出現的前後七子的復古運動，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導致文學風氣趨向死板貧乏，作為言情的詞，更是如此。再從詩文角度上看，重復古，講格調，以為詞托體不尊，有損詩文格調，故多棄而不作，偶爾創作也以遊戲態度視之。在這樣的文風下，詞很難有所發展。明代後期，沿《花間》和《草堂》之習，主情緣俗，詞趨於淺薄香弱，造成意格卑靡、情感不真、模擬成風，側

⁶黃兆漢：《金元詞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年)，頁72。

⁷吳梅：《詞學通論》(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6年)，頁151。

豔俚俗等弊端，也影響到清初詞人多規模花間，講求婉約，風格偏於一隅。因此才有浙西詞派崇尚醇雅，一正當時明末風氣。

清代詞學繼元明後之所以振興，在於作者不再把詞視為小道、詩餘的傳統看法，王昶在《國朝詞綜》序言：

汪氏(1653—1726)(汪森)晉賢敘竹垞太史(朱彝尊)《詞綜》，謂詞長短句本於「三百篇」並漢之樂府。其見卓矣，而猶未盡也。蓋詞實繼古詩而作，而詩本於樂，樂本乎音。……詞以續樂府之後，不知者謂詩之變，而其實詩之正也。由唐而宋，多取詞入於樂府，不知者謂樂之變，而其實詞正所以合樂也。⁸

以儒家傳統詩樂的觀點，以為「實詩之正」，把詞推到與詩等同的大雅之堂，提高在中國文學上的歷史地位，賦予詞新的文學意義。而且清詞的境界較之前代更為開闊，歷經最初的明清易代，到最後滿清王朝被推翻，在清代兩百六十餘年的時間，鮮明的時代特色無不在詞人的筆下有了生動且真實的呈現。在此之前對於詞的內容多描寫風花雪月、反映社會層面過於狹隘；相較之下，清代詞作或大聲疾呼、真切感慨，或訴情隱幽、寄託深遠，如清初的屈大均(1630—1696)、王夫之(1619—1692)等人的詞寫出了明清易代人民離亂之苦。

清初詞除了作者本身的自覺外，也與明清易代的社會背景以及康熙執政初期寬大平和的施政方針有關。順治是清人入關後的第一個年號，但十八年中有十六年與明代的南明王朝共存，其間戰爭不斷，統治者忙於平息南明殘餘的勢力，基本上根本無暇顧慮詞壇的發展。康熙十二年(1673)以前，清代統治者對人民是採取大部份鎮壓與小部份安撫的政策，文人創作的的主要傾向是表現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感情，統治者雖然一方面對待知識份子種種的迫害，但一方面君王又拔擢其才，王昶《詞曲史》：

清初風雅之突勝於明者，亦繫夫君主之好尚，遠過於明之諸宗。觀世祖之於尤侗，聖祖之於姜宸英，世宗之於閻若璩，高宗之於沈德潛，或誦其文，或耳其名，或欽其學，或愛其詩，皆以特識殊遇，拔自寒微；開館編書，

⁸(清)王昶：《國朝詞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集部·詞類》影印上海辭書出版社藏清嘉慶七年王氏三泖漁莊刻增修本)，頁1下。

成就豐大。⁹

清聖祖玄燁是康熙六年(1667)登基，但實際掌握政權則在康熙八年(1669)逮捕鰲拜後。一開始形勢並不樂觀，帝王也深知這樣長久下去不能網羅民心，據《清史紀事本末》：「時海內新定，明室遺臣，多有存者，居恆著書言論，常慨然有故國之思。」¹⁰況且當時去明未遠，明代結社風氣時有所聞，特別是四大臣輔政所發生的奏銷案、通海案及莊廷鑑明史案，給知識份子造成嚴重的陰影，也更加深了他們對前朝的追思之情。爲了緩和可能的衝突，也求安定社會秩序，玄燁一改過去高壓的手段，施行了不少籠絡漢人的懷柔政策，如薦舉山林隱逸，擴大科舉取士名額，設立博學鴻詞科，開館修明史，體現右文的精神，不僅吸收漢族士子加入他們的統治陣營，以認同與發揚漢文化的積極方針，對保護中國文化有了一定的價值，更有利於鞏固清朝政權。玄燁在詞學上積極編訂《詞譜》和編選《歷代詩餘》兩部大型的詞籍，不僅是單純編了一部詞選，爲中國詞學上添了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提倡了一種研究風氣，尤其對明清詞的研究提供了研究的氛圍和支持。在相對寬鬆自由的環境裡，康熙詞壇暫時地出現以詞寫心的現象，近人葉恭綽《廣篋中詞》卷一概括此時作品的特點是：

清初詞派承明末餘波，百家騰躍，……喪亂之餘，家國文物之感，蘊發無端，笑啼非假。其才思充沛者，復以分塗奔放，各極所長。故清初諸家實各具特色。¹¹

它們有的抒發了人們的故國哀思，有的反映了易代鼎革的慘痛歷史。概略了解到明末清初政局對文人的影響後，以下就清初的詞壇概況作出簡述。

第一，清初詞人之多，作品之多，由創作的興盛帶起對理論的繁榮，例如編輯清初的《全清詞·順康卷》，僅就清初的順治、康熙二代人數看來，當代詞人已近兩千一百餘家，詞作計五萬首。相較於宋代的詞家一千三百三十餘人，詞作兩萬八百六十餘首，由這個數字得知清代的詞人與詞作遠遠超越前代的數量，當然數量之多並不能等同質量的出色，然而可以由大量作品求得一定程度的質量，如浙西詞派提倡清雅醇厚，常州詞派的意內言外、比興寄託等等，發前人所未發。理論是創作的結果，創作是理論的發聲，兩者相輔相成，造就出清詞可觀的藝術

⁹王易：《詞曲史》（臺北：廣文書局，1971年），頁444。

¹⁰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鴻博經學諸特科（臺北：三民書局，1959年），頁155。

¹¹楊家駱：《歷代詩史長編第二十二種至第二十三種—廣篋中詞、論清詞》（臺北：鼎文書局，1971年），頁47。

成就。

第二，清初文人已經積極編選前人或當代人的詞集，還有闡述詞學思想。在順治時期，鄒祇謨、王士禎(1634—1711)編選的《倚聲初集》，收錄的詞人由明末萬曆到清初的順治，是一部以今人詞爲主的大型詞選，其意義有三：保存明清之際風格各異的詞作；倡導肯定今詞、研究今詞的風氣；該書的體制宏大，開啓清初詞選喜以巨帙鴻編的風尚。鄒祇謨的《遠志齋詞衷》研究明清的詞話，提出三點觀念：一是引王士禎的話，提出詩人之詞與詞人之詞的說法；二是客觀評價雲間詞派；三是用較多的篇幅評價當時的詞人。除了鄒祇謨外，橫跨順治、康熙的陳維崧(1625—1682)和朱彝尊也有一定的貢獻，這兩人都爲同時期詞人的詞集寫下了序，這些序除了說明作者的詞學觀的同時，也對所序詞集作出評價，如陳維崧的《迦陵文集》收有〈浙西六家詞序〉、〈王良輔百首宮詞序〉等等，朱彝尊著名的有〈靜惕堂詞序〉、〈黑蝶齋詞序〉等等。除了《遠志齋詞衷》外，還有一些詞話，如毛奇齡(1623—1716)的《西河詞話》主要記載一些明末清初的詞壇本事，彭孫遹(1631—1700)的《金粟詞話》主要批評雲間詞派的缺點，對當時詞人如吳偉業(1609—1671)、龔鼎孳、和曹溶等的長調作了較高的評價。王士禎的《花草蒙拾》也有批評雲間的侷限，針對明詞有宏觀的評價。到了康熙這些都足以表現出詞學研究在清初已經受到的重視，更可以視爲詞在清代的中興了。到了康熙時期，因爲有順治開始的學術累積，在康熙可以說是成果豐碩，各種明清詞選大量產生，如顧璟芳、李葵生、胡應宸的《蘭皋明詞匯選》，是一部清人選明詞，大量收集明末的詞，避免因爲戰亂而亡佚。佟世南編選的《東白堂詞選初集》收錄明清詞人三百七十餘人。蔣景祁的《瑤華集》較之《東白堂詞選初集》更注重當代性，更能反映出清初詞壇的創作。除了明清詞選以外，還有古今詞兼採的詞選，以卓回編纂《古今詞匯》，及其他二十多人參與修訂。和康熙領銜主編的《御選歷代詩餘》，其書是官方編定，顯出其體制龐大，資料豐富。其他還有地域性的詞選以及以女性詞選和專題詞選。康熙的詞選大量出現，但在詞話方面，就比較沉寂，涉及明清的有影響的詞話有《御選歷代詩餘》的詞話部份，和徐鉉(1636—1708)的《詞苑叢談》，以及王又華的《古今詞論》，還有沈雄的《古今詞話》，但這四部詞話是以編輯爲主，較少是編者本身的觀點。

第三，清初流派眾多，在清初順治詞壇是晚明的延續，主要活躍的是由陳子龍(1608—1647)、宋徵璧(1617—?)、宋徵輿(1618—1667)兄弟以及李雯(1608

—1647)等為領袖的雲間詞派，雲間就是今天上海市松江縣的古稱，標舉南唐、北宋，帶有明人的習氣，不脫《花間集》和《草堂詩餘》之藩籬，流於香豔淺俗，而於律多疏。如孫默在康熙三年(1664)開始編輯的《十五家詞》，其中不少詞家還未脫離明詞的影響。但因為明清改朝易代所引起的重大變化，使得一些詞人如龔鼎孳、宋婉(1614—1674)、吳偉業、曹溶等人，開始以嚴肅的態度審視詞的文學，詞裡流露家國傾覆之痛、興亡離亂之感，藝術風格有了一些改變。順治康熙的陳維崧領袖陽羨派，陽羨即今天的江蘇宜興市，宜興境內有陽羨山，因古稱陽羨而得名，這群詞人反清的民族意識都比較強烈，身世遭遇又多坎坷，大抵取法蘇軾、辛棄疾，偏向才氣，主豪宕，稍微近於聲律，詞風激昂悲慨，凡亡國之痛、民生疾苦、世情險惡無不入於他們的詞作中，對糾正遺留有明末清初的香豔柔媚有重要作用，但由於陽羨詞派為區域性詞派，活躍時間僅四十年左右，故未能成為詞壇主流。因此浙西詞派在康熙興起，以醇雅為宗，才真正轉變清初的詞風，發揚南宋姜夔與張炎的风格，以此矯正蘇、辛的豪放顯露，力主清空雅正、格律嚴謹的內涵，旨在以詞這樣的文學形式寄託家國身世的感慨，朱彝尊推崇王沂孫(?—1290)、周密(1232—1298)、張炎等的宋末遺民咏物唱和的《樂府補題》，該書有黍離之悲的亡國哀思，也曲折表達改朝換代之痛的深意，此一詞集經由朱彝尊等人的流傳，對當時詞風的轉變和浙西詞派起了很大的作用，因為朱彝尊了解遺民詞中的言外之意，達到寄寓家國身世之感，也不直接碰觸政治核心，因而能風行一時，浙派至厲鶚(1692—1752)最盛。陽羨與浙西兩派各領當時風騷。獨立在這兩派之外，還有京華詞苑的詞人，有滿州詞人納蘭性德，江蘇無錫的嚴繩孫(1623—1706)、顧貞觀和山東安丘的曹貞吉(1634—1698)最為有名。這裡僅舉例滿州詞人，納蘭的個性和作品很像李後主(937—978)，所作詞不甚依格律，不重視模擬，不喜用古典，而是以俚語寫自己的情思，語意渾然天成，不矯揉造作。陽羨派的衰落、浙西派的興盛、及獨立的京華詞苑，清初詞壇概況至此，大局已定。

經由前述之清初詞壇概況，可以了解到清詞之所以繼宋代輝煌、元明衰落之後，又有了中興的氣象，固然有其發展的歷史原因與社會原因，但更引起注意的是整個時代風氣展現出來詞人的自覺，這種自覺是鮮明成熟的，不只在詞人與詞作的數量，反映在編輯的總集和選本中，以及詞話整匯出對詞的理論和見解，跟隨時代、地域的不同而流派紛呈，也反映出各自的詞學主張。

第二節 曹溶之生平

曹溶，一字潔躬，又字鑿躬，號秋嶽，別號倦圃，又作金陀老圃，晚號鋤菜翁，浙西秀水(今浙江嘉興)人。筆者將曹溶生平分成仕明時期、仕清時期與退隱時期三個時期，分別說明。

一、仕明時期

曹溶，祖籍平湖，後居嘉興，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卒於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從高祖曹文鐸，分別作過兗州和肇慶二州的郡守。曾祖曹志道，選貢教授。祖，曹仙華，萊州衛經歷，卒於崇禎壬戌年。父曹尊何，以曹溶侍郎官贈蔭。曹溶少年時期即有才名，在家鄉與友人結社，詩文唱和。

明代崇禎九年(1636)，時曹溶二十三歲。曹氏參加鄉試，且應試考上舉人。次年曹氏到京城考試，同年三月，為三甲第三名進士，同年六月，曹氏參加考選被授行人，正式授與官位。崇禎十一年時，曹氏赴武昌任學使。次年，曹氏於順天府主持舉人考試，考試結束後，曹氏繼續擔任河南道御史一職。曹溶在二十多歲的時候就考上進士並且擔任官職，可以推知曹溶是聰穎且有抱負的人。

到了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帶兵入京，對還留在北京的明朝臣子進行掠奪拷打，不少臣子因此投降逃跑。這時因為浙直總督張國維派任曹溶為浙直監軍御史，所以曹溶仍留在京中，卻難逃其害，因此受腳傷留在京裡。抱著一絲希望期待明軍能將李自成趕走，沒想到最後來的不是明代太子，而是大清王朝。¹²這時曹溶作有一闋〈青衫濕·田戚畹家姬東哥，甲申後為教師，遇之，有感〉說道「重翻宮調，開元舊曲，知付誰家」，表面上寫歌伎，實際上是「支付誰家」，是明朝

¹²此段可見(清)錢●：《甲申傳信錄》卷四：「甲申三月，浙直總督張國維題授浙直監軍御史，未行，被獲重掠，悉索寓物，納二百兩。賊志未厭，再加嚴刑，傷足舁出，又納五十兩。發王旗鼓再拷，王為山右諸生，嘗讀溶文，詢知為溶，釋之。數日後，文論院楊枝起招之，授職，足創不能行。又數日，闖遁。客勸其倡守都城，以待太子，而遇于清。」(北京：新華書店，2000年《四庫禁燬叢刊·史》影印清鈔本)，卷四，頁270上。

能繼續統理中原、還是清代新主入仕？就連身在京城之中的曹溶，對於政治局勢仍是憂心不已。此闕下片又說道：「此身似燕，春巢畫棟，秋宿平沙」，曹溶暗喻自己像燕子一樣，先前的時候還是明代的政局，沒想到不久後卻被清人取代。一者「畫棟」、一者「平沙」，可見曹溶對於外來的政權還是有不滿擔憂的心情。

二、仕清時期

清代順治元年(1644)五月，曹溶投降清朝，繼續留任河南道御史一職。曹氏看到當時明末政治衰敗，君臣之間沒有各司其職、各盡其任，連年用兵徵稅，盜寇四起逃竄，導致民不聊生，國力大失，因而疏陳六事，希望民生得以休息。¹³清朝當局深切贊同曹溶的疏言，對於他所陳六事，立刻下旨讓六事推行。同年六月，曹溶授順天學政，針對舊例的考試制度提出改革，認為舊時選拔貢生，是八府一同舉行考試，但是經過明末清初的戰爭之後，影響考生的考試路途遙遠，應該各府一年考試一次，免於考生長途跋涉之苦，並且應考量考生的經濟能力，給予考生路費備試，為考生設想。¹⁴並針對明末李自成闖入京城，因此犧牲不少殉義的志士，曹溶提倡褒揚節義，意圖導正風氣，因此再次上奏疏言。¹⁵又請以遼東十五學改附永平府，分設教官，如各州縣學例。不久疏薦明代進士王崇簡(1602—?)等五人，又請旌殉節明大學士范景文(1587—1644)、尚書倪元璐(1593—1644)等二十八人，孝子徐基等七人，義士王良翰等五人，及節婦十餘人。曹溶勇敢薦舉才德之士，在當時也有匡正風氣之效。隔了兩年的二月，曹溶做會試監試官，疏請嚴防各種考試作弊的積習，寬免字畫粗率、格式參差的貼例。¹⁶這次上奏，因其

¹³王鍾翰：《清史列傳》：「一請定官制，使事有責成，不相推諉，又上下情宜浹洽，庶人思效用；一請定屯田、鹽法、錢法規制，俾俸餉有所給取；一請禁兵丁牧馬，踐食田禾；一請有司巡緝土賊，擒為首者誅之，餘皆勸諭向善，則不煩兵力而賊寇自靖；一請發帑金，於近畿麥熟處平糶，以裕倉儲，備賑恤；一京師採煤西山，近因盜賊梗路，兩月不至，請設兵循徼，使無劫掠之虞。」(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6491。

¹⁴同註11：「舊例選拔貢生，彙八府諸生通考。今畿輔當兵燹之後，諸生或艱於遠涉，宜徧歷各府，舉行歲考，補給廩額。即於廩生中拔其尤者，府學貢二人，州縣學貢一人。順天府學首善，士多請貢六人，並令官給路費，詣廷試分別選用。至各省士子，有遊學京師者，宜令附順天府學考試，其入學補廩充貢，俱於正額外，另議名數。」

¹⁵同註11：「褒揚節義，有關風教，當闖賊煽惑時，誓師殉義者不少，宜敕學臣詳訪請旌。其隱逸之士有深通古今，明於治術，熟諳韜略，周知地利者，許特疏薦舉，以備徵用。」

¹⁶同註11，頁6492，「奏請嚴防懷挾傳遞、移號換卷諸積弊，寬免字畫粗率、格式參差之貼例，

所奏會場事宜簡明切當，禮部因此即刻推行。同年三月，曹溶遷太僕寺少卿，但因於曹溶在順治元年六月任順天學政時，所舉充貢監中，有曾經在明代襲世職及中武學者，後來事情被察覺，曹溶坐失察，被降二級調用。不久又因選拔貢生超過人數，被革職回籍。在這三年為官期間，曹溶常和吳達(雪航)、袁于令(令昭、籜庵)(?—1674)、李雯(舒章)(1608—1647)、張學會(爾唯)、金之俊(豈凡)(?—1670)等人集會，或悲嘆、或感慨，或抒人世離愁、或哀人生無常。這次曹溶被革職離京，陳之遴(1605—1666)、宋琬諸多友人都為他餞別送行，曹溶作有〈玉樓春·張爾唯命寇白勸酒〉。

曹溶在順治四年的時候，因去年革職歸里，所以移居吳郡(即今蘇州)。在蘇州一住就是五年。隔年，龔鼎孳也到了吳郡，不久和曹溶相約在杭州見面。曹溶在嘉興范蠡湖旁邊買下南宋岳珂(1183—?)以前讀書的別業金垞老圃(即倦圃)。此事可見朱彝尊《曝書亭集·倦圃圖記》¹⁷。過了幾年，曹溶由蘇州回到嘉興，在家鄉游鶴洲，與老友會面，生活相當愜意。這時作有〈摸魚兒·約濟武遊鶴洲〉、〈淡黃柳·約史蘧庵遊鶴洲〉兩首。

到了順治九年，曹溶回到京都，在京都的友人都置酒歡迎曹溶回京。隔年曹溶因范文程(1597—1666)舉薦，官復原職。入京後，經常和當時正任大學士的陳之遴往來，並且曹溶遷家到陳家附近居住。二人同屬南黨，也同樣受到北黨的打擊。次年浙江同鄉的遺民談遷(1593—1657)因修纂明代歷史到北京收集資料，拜訪了家富藏書的曹溶。談遷初到京城，便寫信給曹溶，希望曹溶能多留意有關前朝舊事，在〈上太僕曹秋壑書〉云：「先朝召對事迹，云在朱都諫子美處。及秘錄、公卿年表等，萬乞留意。祠曹或素所厚善者，于宗室薨賻，大臣賁卹，月日可詳，特難于萃輯耳，希望萬一。」¹⁸曹溶也探望過談遷，並向他講述前朝歷史舊事。兩人不斷往來，曹溶對談遷的用心大加肯定，不僅在前朝史事的提供上有所幫助，也提供資料助他著書。談遷常向曹溶借書，曹溶也毫不藏私的給他看珍藏的本子，此事在談遷的《北游錄》中有記載：「庚申，曹太僕見枉，語先朝事兩則。」¹⁹、「丁亥，陰。過曹太僕借書。出劉若愚(1584—?)《酌中志》三表。

膳錄務期端楷，對讀宜令詳審。」

¹⁷(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倦圃距嘉興府治西南一里，在范蠡湖之濱，宋管內勸農使岳珂倦翁。……戶部侍郎曹先生潔躬，治之以為別業，聚文史其中，暇則與賓客浮觴樂飲，其以倦圃名者，蓋取倦翁之字以自寄。」(臺北：世界書局，1964年)，頁775。

¹⁸(清)談遷：《北游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267。

¹⁹同註16，頁50。

孫侍郎北海《崇禎事蹟》一表。……侍郎輯崇禎事若干卷，不輕示人，又著《春明夢餘錄》若干卷，並秘之。」²⁰除了知識上的幫助，曹溶也給予談遷經濟上的援助，同樣可見於《北游錄》：「癸酉，答朱生生，留飲。……飲間，曹秋壑貽我銀杯。辭。」²¹除了著書和經濟上的幫助外，曹溶還介紹太倉吳偉業和武功霍達給談遷，其中吳偉業熟識明末掌故，親身經歷過許多明末的事變，交游也很廣泛，談遷也因此問以先朝遺事。可以想見，曹溶雖然仕清，但對於明代仍存有懷思。又次年，曹溶授太常寺少卿一職，尋遷左通政，有了為官的機會，曹溶再次上書疏言：「通政之官，職在納言。請嗣後凡遇挾私違例章疏，即予駁還，仍行劾奏。至遠近災荒，民生吏治，宜許通政司諸臣就章疏所列，隨事建言，無忝敷奏之任。」²²又言：「開創時隨處駐兵，乃一時權宜。今當歸併於盜賊出沒、險阻不測之地，則兵不患少，其閒散無事之兵，遇缺勿補，遇調即遣，則餉不虛糜；且當裁併提鎮，改增副將，以專統轄而重責成。」²³再言：「諸司職掌，未有成書，請以近年奉旨遵行者，參以前朝會典，編為簡明則例，以勵官守。」²⁴此年三月，曹溶擢為左副都御史，後又擢為戶部右侍郎，此時曹溶疏請時御便殿，召大臣入對，以辨臣子的才識品行，並賜給筆札，命令臣子面舉所知，可杜絕臣子們對皇帝的瞻徇欺蒙之弊。又言：「明代中葉以後，議論盛而實事衰，至今積習未改。欲使羣臣鼓任事之心，言官作敢言之氣，在斷自宸衷，遇諸臣章疏切中利弊者，即敕力行。有辨言亂政，挾私撓法者，即摘發示戒，無概下部議，以致稽延。」²⁵這年，是曹溶官場上最為得意順利的一年了。然而，順利的背後，卻隱藏著風險的伏筆，即是南黨之一的陳名夏(1601—1654)，以「結黨懷奸」、「倡留發復衣冠」等罪名入獄，最後處以死刑，南黨這時候受到北黨的打壓而處於下勢。

曹溶在順治十二年九月，因為吏部、都察院會奏侍郎、寺卿等官，將才優經濟改為外用，於是曹溶被外調為廣東布政使。不料，又因為顧仁案而受到牽連，等候處置。同年十二月末，曹溶雖被官降一級，仍然赴廣東任。隔年曹溶在離開北京前往廣東之前，他先回到浙江，再由浙江入江西，過福建南安到廣東，又過邵州、抵達清遠等地，最終到了廣州。在廣州除了應酬當地的達官之外，還和當地文士遺民交往，如張升等人，作有〈孤鸞·招夏樂只、張登子、程古狂、沈逢

²⁰同註 16，頁 55。

²¹同註 16，頁 127。

²²同註 11，頁 6492。

²³同上註。

²⁴同註 11，頁 6492。

²⁵同上註。

吉、張較書集舟中》、〈念奴嬌·同鐵崖、古狂、逢吉集登子寓樓，吳姬適至〉、〈念奴嬌·登子招同鐵崖、循蜚、古狂飲采友堂，坐有張較書〉、〈風流子·寄登子〉。同時曹溶好友龔鼎孳因為多次在順治皇帝面前袒護漢人臣子而連降八級，又因為顧仁案牽連再降三級，被貶為上林丞廣東宣旨。也因為這樣，龔鼎孳在廣東和曹溶相見，同為貳臣、同為被貶，那種同病相憐的心境，使兩人的來往更為密切。曹溶因而作有〈浪淘沙·夜思同芝麓作〉、〈虞美人·同龔芝麓、沈止嶽席上觀伎〉、〈念奴嬌·感春和芝麓〉。曹溶在廣東不到一年，即遇京察，戶部認為曹溶曾任侍郎，應該改布政使，牒吏部同都察院審核，但結果是認為曹溶舉動輕浮，應以浮躁例降一級。這次的降級，與陳之遴脫不了關係，因為順治十一年時候，南黨的陳名夏入獄被殺，陳之遴繼之為南黨的支柱。陳之遴是曹溶的好友，不但有同年進士之誼，更有同鄉浙江之情。這次曹溶被降山西陽和道，備兵大同。但曹溶並沒有立即至山西大同赴任，更因為順治十四年，遭逢祖母之喪，回家鄉守孝，大約休息了五年才到山西赴任，作有〈永遇樂·雁門關〉。

到了順治十四年，朱彝尊因山陰秘密組織的反清活動被揭發，迫於生計，前往投奔曹溶。曹溶帶著朱彝尊結識許多當地有名的詩人和抗清人士屈大均、陳恭彥等人。在詩歌的酬唱和反清情緒的蘊釀中，曹朱結下深厚友誼，曹溶還教導朱氏如何填詞。朱彝尊不僅在政治上有了依靠庇護，在曹溶的幕中也有足夠的閱讀機會，因此，曹溶對朱彝尊有提攜之情，朱氏曾屢屢在詩文裡表示感激。在嶺南時，朱彝尊幫曹溶整理甄錄《嶺南詩選》，並抄撮群書。

在康熙三年，曹溶受山西巡撫白如梅派遣到京慶賀萬壽聖節(即皇太后的誕辰)，曹溶藉此機會上書說明大同屯地的利弊，說明疏言。²⁶又請：「沿邊設墩軍，墩每五人，每人與近墩荒地一頃，免其徵輸，使擊柝巡邏，兼供修葺邊牆之役。」曹溶返回大同不久，清朝撤其按察副使一職，曹溶留守山西備用。此年大同大旱，民不聊生，曹溶見此景象，四處籌糧救民，曾給冒襄(1611—1693)寫信：

先生詩文滿天下，世有元禮龍門之目。其在弟胸臆間者久，同于謀面也。嶠公從江上捧大著而還，風雪夜，篝燈讀之。字字挾吉祥氣，噓饑骨而能語，乃知向來以詩文相推重者，淺之乎窺先生也！李令君易水樸儒，宜民

²⁶同註 11，頁 6493，「大同屯地，舊例每頃徵銀不及一兩。至兵丁墾沿邊荒地，向不徵銀，名曰「贍軍地」。後因軍餉不敷，每頃每月扣餉銀二錢，兵已貧乏。近因兵額裁減，所遺之地分撥現在之兵，有每兵三四頃坐扣月餉者，為累滋甚。請嗣後限每兵二頃，如屯田徵銀之數，按月扣餉，地少則力可任耕，租輕則兵仍足食。」

多效，自非匡持不易，及此顧旱潦頻仍，南北相望，水繪庵中沉幾靜理，必有洞察其微，為救時良畫者，弟竊因嶠公請萬一，幸慨而教焉。²⁷

冒襄在回給曹溶的〈會曹秋嶽先生詢救荒書〉中說：

君相發賑無厭，大吏不憚寒暑，躬行于冰雪稽天之，浸之間惟力是視……先生救時宰相，抱膝而觀天人之微，洞如指掌，亦何所取于乾螢老蠹？來教鄭重真切，令從故●堆中拾此陳言以進，恐不足當一掩口。然既承明命，不敢不竭其愚，伏枕口授以對，何時負笈一逐瞻依，或能盡所未盡耳。²⁸

曹溶為百姓請命的行徑，使遺民冒襄也能挺身而出，對曹溶的行徑讚譽有加，可見曹溶雖為貳臣，卻不為自身利益謀求富貴，而是以天下為己任。這年九月，朱彝尊遠訪雲中，在曹溶的山西兵備署幕職四年，兩人詩詞倡和。

曹溶在康熙六年離開山西，出井陘，過大名。曹溶、顧炎武、史赤豹從不同地方相會於大名。作有〈采桑子·寄赤豹〉、〈翻香令·史赤豹貽宜興所製瓷爐〉、〈江城梅花引·除夕和赤豹〉、〈倦尋芳·招赤豹飲倦圃〉、〈瑞鶴仙·和赤豹弔朱買臣，墓在福城寺中〉等詞。隔年曹溶在家鄉嘉興杭州等地。康熙七年到十四年之際，曹溶的足跡在浙江、江蘇之間，或在浙江各地游玩，或在倦圃，與各地來倦圃的友人宴集。在康熙十三年三藩暴亂，曹溶受到薦舉，大約在康熙十四年到十六年間，曹溶是隨征福建。

三、退隱時期

到了康熙十七年，康熙平定三藩之亂的日子指日可待，讓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在外督撫、布、按，推薦有學行並且文詞卓越的人。曹溶受到大學士李蔚(1625—1684)、杜立德(1611—1691)、馮溥(1609—1692)的薦舉，但卻因丁母憂，不赴。此年徐鉉(1636—1708)編的《詞苑叢談》、朱彝尊編的《詞綜》刊行。次年康熙十八年，朱彝尊以布衣進京應博學鴻詞科之試，三月殿試稱旨，特授翰林院檢討，遂名重京師，進京攜帶宋遺民王沂孫和張炎等的咏物倡和詞集《樂府補題》

²⁷見(清)冒襄撰：《巢民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影印)，卷三〈秋岳先生來書〉，頁595下。

²⁸同註25，頁594下、頁595上。

鈔本，迅即由蔣景祁在京都鏤版以傳。由龔翔麟(1658—1733)匯編的《浙西六家詞》在南京刊行。又次年大學士徐元文(1634—1691)薦曹溶佐修明史。部議俟服滿牒送史館，曹溶以家貧多病等理由辭而不受，但獻上當時未有實錄的崇禎朝邸報五千餘冊，明史館輯之長編作史。這幾年曹溶和唐夢賚(1628—1698)、吳陳琰等唱和。此時晚年的心境走向平和閒淡，閒暇時和友人飲酒唱和，遊玩填詞，除了別人來訪曹溶，曹溶也出遊拜訪朋友。曹溶作有〈一叢花·再飲唐濟武寓中〉、〈一叢花·三飲濟武寓中〉、〈法曲獻仙音·飲濟武寓中〉、〈萬年歡·唐濟武太史過訪耕石齋小寓，次史邦卿舊韻〉、〈萬年歡·濟武命飲白鹿泉亭，再疊前韻〉、〈萬年歡·濟武同諸子過周雨文山房〉、〈萬年歡·濟武席上聞歌〉、〈萬年歡·同濟武、香巖、雨文、星期雪中小飲，是夕沈生度曲，程生鼓琴〉、〈萬年歡·和濟武感懷〉、〈摸魚兒·濟武見訪示一詞，次韻奉答〉、〈摸魚兒·疊前韻，答吳寶崖見懷。寶崖武林人〉、〈摸魚兒·濟武同諸君過飲倦圃，三疊前韻〉、〈摸魚兒·同止岳過濟武寓中，疊前韻〉、〈摸魚兒·題寶崖像〉、〈摸魚兒·和濟武夢趙韞退疊前韻〉、〈摸魚兒·陳用直堯夫攜尊濟武寓中同集疊前韻〉，從這些詞作中看出曹溶晚年的生活是很悠閒自在的，雖不免對政治上的順逆有所感慨，但大致而言，心境上漸趨清柔閒雅。曹溶卒年七十三，入國史文苑傳。

第三節、曹溶之著作

本節將曹溶的作品分爲《靜惕堂詞》與其他著作兩部份討論。

一、《靜惕堂詞》

曹溶詞集爲《靜惕堂詞》，筆者以爲其命名是出自易經〈乾〉卦九三爻辭：「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²⁹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易傳·二三子》說：《卦》曰：「君子終日鍵鍵，夕沂若，厲無咎。」孔子曰：「此言君子務時，時至而動，□□□□□□屈力以成功，亦日中而不止，時年至而不淹。君子之務時，猷馳驅也。故曰：『君子終日鍵鍵』。時盡而止之以置身，置身而靜。故曰：『夕沂若，厲无咎。』」帛書中孔子對此爻辭的解釋突出一個「時」字。「君子終日鍵

²⁹(宋)程頤、朱熹：《易程傳 易本義》(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頁12。

鍵」，是「君子務時，時至而動」；「夕沂若，厲無咎」，是「時盡而止之以置身，置身而靜」。也就是說，孔子認為這一段爻辭「君子終日鍵鍵」，是講君子在「時至」的時候，要抓住時機，順時而動，奮發有為，自強不息；「夕沂若」，是講君子在「時盡」的時候，「要止之以置身，置身而靜」，即時機未到之時，要靜止下來，養精蓄銳，休養生息，待時而動。這樣，能動能靜，一切依時而行，即使面臨險境，也能免遭咎害。

所以筆者以為曹溶取名為靜惕二字，是取其把握時機，宜動宜靜，順勢而為之意。如他在政治上的作為，無論是在朝廷受重用，或因貶謫到邊遠之地，都能順應時局，致力為百姓做事，才能不負取為「靜惕」二字的用意。

二、其他著作

曹溶的著作，除了《靜惕堂詞》以外，尚著有《崇禎五十宰相傳》、《明漕運志》、《古林金石表》、《倦圃蒔植記》、《流通古書約》、《劉豫事迹》、《硯錄》、《靜惕堂詩集》。此外，曹溶還輯有《學海類編》。試介述如下：

(一)《崇禎五十宰相傳》六卷 年表一卷

此書《樵李詩繫》作《崇禎五十輔臣傳》。《欽定四庫全書存目提要》將其歸於史部傳記類。記崇禎時入閣諸臣事蹟，共含傳六卷、年表一卷。明初自胡惟庸事件以後，明太祖朱元璋廢丞相一職，此後入朝辦事者便以相國稱之，曹溶此書即從俗稱題為「宰相」。所載事蹟可與明史詳略相參。³⁰

(二)《明漕運志》一卷

漕運，指中國歷史上從內陸河流和海路運送官糧到朝廷和運送軍糧到軍區的系統。漕運的奠基應上溯到隋代，雖然隋代為了開通運河，造成民不聊生、死傷無數的悲劇，君主的目的也不全然是為經濟，而是便於北方戰爭以及君主的遊樂之故，但是，後來唐代的運河基礎卻完全是靠著隋煬帝所開挖的運河，創造極其有利的條件，到了後來的宋元明清，漕運始終有著極其重要的功效利益。《明漕運志》以明朝永樂元年為始，經宣德、成化、嘉靖、萬曆十二年止。其書記載有

³⁰(清)曹溶：《崇禎五十宰相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傳記類》影印南京圖書館藏清研古樓抄本)，第537冊，頁91上。

關於河道的運輸位置、開通運河的工程、工程民夫工匠的調度……等等，對於了解明代漕運有一定的幫助。

(三)《古林金石表》一卷

曹溶任山西陽和道一官期間，對金石文字十分感興趣，爲了保存石刻文獻而遠搜近涉，大量的搜集金石碑刻，藏有十分珍貴的金石拓本、鐘鼎銘文，並將一生所見碑拓集爲此書，經以碑文、緯以撰者書者的姓名，以及所立之地，與世與年合而成表。其序中提及：「予行塞上，見古碑橫蒨草間，偶一動念，古人遺跡歷千百年，當吾世而湮沒之爲可惜。搜自境內，以及遠地，積五年得八百餘本，手自較勘，至廢寢忘食。」顧炎武、朱彝尊等人都是曹溶金石的同好，他們曾一同訪碑求刻，親自推拓碑文。³¹

(四)《倦圃蒔植記》三卷 總論兩卷

根據曹溶在序文末所題「康熙甲子立夏後二日倦圃老人書」，可知此書是曹溶晚年在倦圃退隱生活的興趣所寄，涉筆及之。對於種植的方法曹溶多是仰賴熟諳此道的師傅指導，因此曹溶將其所習所知一一記下。含總論分爲上下兩卷，含總論第一、論木第二、論花第三、論果第四，下卷論蔬第五、論瓜第六、論豆第七、論竹第八、論草第九、論盆樹第十、雜論第十一。正文部份分三卷，卷上記載的是花卉一，有牡丹、芍藥、蘭蕙等等，卷中記載的是花卉二，有罌粟、酴醾、瓊花等等，卷下記載的是竹樹。內容包括世人對植物的評論、植物的實用價值、植物的地域性以及如何種植此類植物、季節時序的生長交替等等，曹溶都依其平常對植物的觀察逐步記載，可知曹溶對於記述的花草樹木，往往有所接觸，不至於落入紙上談兵的窠臼，是真正實地栽培照顧，而有所收穫。³²

(五)《流通古書約》一卷

曹溶是清初的藏書家，《流通古書約》就是曹溶訂立的流通書籍協定。他認爲古書應該要交流互通，尤其能遇到賞識知音的人，著作的價值就更大了。因爲古人往往是竭盡畢生心力才能成就一本著作，如果爲了己心藏私，或長久不流傳，或天災人禍造成古書失傳亡佚，是一件很可惜的事。但古書並不能只有借出，

³¹(清)曹溶：《古林金石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石刻史料新編》影印國立中央圖書館珍藏之善本)，第2冊，頁14893上下。

³²(清)曹溶：《倦圃蒔植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續修四庫全書·子部·譜錄類》影印清抄本)，第1119冊，頁257上。

而必須互通有無，因此曹溶提出自己的看法，規定要借他人的圖書，必須先帶上自己的藏書目錄，登門交給對方過目，若對方有欠缺的書目，雙方約定日期，雙方派門下精於抄寫的人各到對方的家中抄錄，而且所抄的數量也要相等，抄完後將抄本各自帶回，不能把原書帶走，以防遺失，也以防原書在舟車勞頓或遇上水火之災。曹溶訂定的規則，對於古書的流通很有建設性。³³

(六)《劉豫事迹》一卷

劉豫(1073—1146)，字彥遊，宋景州阜城人(今河北崇縣)，世代務農。宋哲宗元符年間進士，徽宗政和二年拔擢為殿中侍御史。宣和六年，出為河北西路提刑，時逢金兵南侵，劉豫即棄官避於儀征。之後宋高宗趙構起用為濟南知府，建炎二年，金兵進攻濟南，劉豫殺害手下抗金的將軍關勝，降金。建炎四年，受金人冊封為皇帝，國號大齊。金人將黃河以南歸劉豫統治，試圖達到「以漢治漢」的目的，以大名府為首都，改年號為阜昌。劉豫屢次引金兵攻打南宋，但因出師不利，且無法緩和黃河流域的抗金戰爭，遂被金朝廢為蜀王，劉豫一家被迫遷至臨潢府，終老至死。劉豫建立的齊國，被正統的歷史學者稱為「偽齊」，一般稱為「劉齊」，存在共八年。³⁴

(七)《硯錄》一卷

此書凡一卷共七篇，第一篇山川，第二篇神理，第三篇採鑿，第四篇品類，第五篇別種，第六篇辨訛，第七篇鑑戒。第一篇談論的是硯的生產，江水從西南來，大海從東北湧入，兩水交會之處的天然地理位置，所孕育的水質是適宜產硯石。第二篇說明一塊好的硯石，自洪荒來不見風日，故其質地色澤是上上之選，長年不因使用縮小，受墨汁膩而相親含，對毛筆也是有保護作用。第三篇說明好的硯石會產自怎樣的地形，又該如何採鑿。第四篇說明等到採集到硯石，還要懂得分辨高下，最好的硯石的紋理本質是如何，下等的硯石又要如何辨別，最後還談到了人工製造的假硯石。第五篇說明雖有稱硯石者，但因為石硬滑不發墨，這樣就談不上硯石的功能，這類的硯石往往以假亂真，不可不注意。第六篇說明曹溶詢問採硯石的工人，以明辨偽。第七篇說明不能用石製硯，失去硯的本質，以待讀者鑑戒。

³³(清)曹溶：《流通古書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叢書集成新編》)，第2冊，頁752上。

³⁴(清)曹溶：《劉豫事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傳記類》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清抄本)，第550冊，頁261上。

(八)《靜惕堂書目》宋人集一卷元人文集一卷

王士禎《池北偶談》云：「曹秋岳侍郎好收宋元人文集，嘗見其靜惕堂書目，所載宋代自柳開(947—1000)(《河東集》)以下凡一百八十家，元自耶律楚材(1190—1244)(《湛然集》)以下凡一百十有五家，可謂富矣。」此書葉德輝(1864—1927)於《靜惕堂書目序》中稱：「今按此本宋自徐鉉(916—991)《騎省集》以下，凡一百九十六家，元自元好問(1190—1257)《遺山集》以下，凡一百三十九家，較文簡所見共多四十家。」蓋葉德輝所見為最足之本³⁵。

(九)《靜惕堂詩集》四十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靜惕堂四十四卷》提要：「溶記誦淹博，詩文亦富，然其集初無定本，篇帙多寡不一，有作三十卷者，有作正集八卷、續集三卷者，皆不知何人所編。此本為雍正乙巳刊行，凡古今體詩幾四千首，乃其外孫朱丕戡所哀輯，溶生平吟詠，蓋具在於是矣。」《靜惕堂詩集》為雍正三年直隸總督李維鈞所刻，但在同年冬天李維鈞以黨年羹堯(1679—1726)而得罪，故削去李維鈞原序，及末板李維鈞校刊字樣，李維鈞在序裡提到：「倦圃先生以詩名噪宇內者近百年。胸中藝海籠蓋一切，而道氣常勝，不露圭角，非尋常所得。……先君子愛先生詩每錄之嘗枉駕過梅里憩吾廬，兼旬累月，盤桓弗厭。如是者，歷有年歲。」³⁶道光中王相刻(生卒年不詳)清初十大家詩鈔，求《靜惕堂詩集》僅得鈔本，選刻八卷，今賴信方閣本，可補其缺字，曹溶填詞最負盛名，《靜惕堂詞》之刻較早，故不附於詩集。鄭方坤《名家詩鈔小傳》言：「少日即以詩名，年事漸增，風格日進，體氣自然，意匠深穩，與龔芝麓宗伯異曲同工，卓然為國初一大家。李天生(生卒年不詳)稱其五古：『如羚羊掛角，無迹可尋，而渾金璞玉中，奕奕自露神采。』」³⁷可見曹溶在詩方面，頗得時人推崇。徐世昌(1855—1939)編《晚晴簃詩匯》卷二十選曹溶詩二十一首，《詩話》云：「阮亭《秋柳》詩，和者甚眾，以亭林、秋岳為絕唱。秋岳少有詩名，中年風格日進，李天生稱其五古：『如羚羊掛角，無迹可尋，而渾金璞玉中，奕奕自露神采。』又云：『意取其厚，詞取其自然，所以復漢京也；調取其俊逸，格取其整，所以明《選》體也。』……集

³⁵(清)曹溶：《靜惕堂書目》(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叢書集成續編》)，第2冊，頁347上。

³⁶(清)曹溶：《靜惕堂詩集》(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7月第一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影印首都圖書館藏清雍正三年李維鈞刻本)，第198冊，頁1。

³⁷(清)鄭方坤：《名朝詩鈔小傳》(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叢書集成初編》影印龍威秘書本)，第3382冊，卷一，頁22。

中古體諸詩，當之無愧，五七律根柢浣花，間涉崑體，蓋魄力深厚，故能奄有眾長也。秋岳家富藏書，勤於誦覽，好收宋、元人文集。天性愛才，聞人有一藝，未嘗識面，譽不去口。主詩壇者數十年，才士歸之如水赴壑。晚年自號鋤菜翁，又號金陀老圃，築室范蠡湖，顏曰『倦圃』，雜栽花竹，文讌無虛日，時有『北海賓朋，東山絲竹』之目。³⁸其中《粵遊草》一卷在順治十三年廣東為官時所作，可以從其內容得知曹溶在廣東的生活。古體三十首，近體二百八十一首，已編入《靜惕堂詩集》中。

(十)《學海類編》

曹溶輯，陶樾增訂。陶樾為曹溶門生。此書是清代的大型叢書，所錄古今書計有四百二十餘種，為海內士大夫家藏抄本，是世人稀見者。依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全書分為經翼、史參、子類、集餘四類。集餘一類，因雜著繁多，又分行詣、事功、文詞、記述、考據、藝能、保攝、遊覽八類。各書排次概依作者先後而類序，之中又有區分者，如經翼是以十三經為次，史參以朝廷為次，事功以六部為次，遊覽以今京師而外省而邊海為次。因篇帙繁富，極少有副冊，今所見凡十冊，是民國九年上海涵芬樓據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以活字排印的影印本。³⁹

綜合上述，第一節從知人論世的角度切入，先論在明清易代的背景之下，政治局勢由混亂到安定，詞壇概況的風氣特色。第二節重點在曹溶屢起屢蹶的仕途，遊徙各地的經歷，廣泛交遊的個性，都為他的《靜惕堂詞》豐富了內涵、增加了深度。

³⁸(清)徐世昌：《晚晴簃詩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影印民國十八年退耕堂刻本)，第1629冊，卷20，頁372下。

³⁹(清)曹溶：《學海類編》(臺北：文源書局，1964年影印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活字印本)，頁1至頁5。